

比较的假肢：当“我比”变成“比我”

假肢不是替人走路，是让人在一种精准的安心里，把自己不再走路这件事感认为自己还在走

胡志英 著 · SDE 学员 · 比较认知与评价技术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比较被尊为理性的原型，却在当代社会越来越让人疲惫、避之不及。学界通常将此归因为比较的过度或比较方式的偏差。本文提出一个更根本的判断：当代数字排名与标准化评价对比较的改造，要害不在于外部权力缴走了认知者的“追问权”——这一诊断仍然预设了一个天然拥有追问能力的、等待被解放的主体——而在于它用一套精密预制、自我闭环的比较假肢，从内部替代了认知者自身比较动作的发动回路。假肢不是替人走路，是让人在一种“精准的安心”中，把自己不再走路这件事感认为自己还在走。比较的形态跃迁，不是被外部力量杀死的，而是条件变了：比较从一种活的发动，被生成了另一种形态——假肢化的接收。其形式还在，比较者却不在了。

关键词：比较认知；假肢；发动回路；标准化评价；认知主体性

本文将这一机制命名为“比较假肢”。通过对发动回路（亲感缺口、自命名冲动、闭合不耐）的生成机制解剖，阐明假肢如何经由“绕过→遗忘→篡改感知”三步完成了从捷径到唯一路径的替代。以与斯蒂格勒技术代具论、追问权诊断范式、认知外包、规训理论、系统1/2框架、布迪厄误识概念的六重区分确立其不可还原性：假肢替代的不是“功能执行”，而是“冲动发生”。补入正反两个真实案例展示替代的生效与失效条件；正面回应“假肢只是提高了认知起点”这一最强替代解释；指出发动回路未被替代的条件，恰是假肢生效逻辑的反面证明；并给出可操作的证伪检验方案。

一、一个问题：比较活着，但谁在比

比较是件很奇特的事。我们每天都在比：比价格，比方案，比哪条路更值得走，比谁的判断更站得住脚。在学术语境中，比较被尊为理性的原型：没有比较，何来区分；没有区分，何来概念；没有概念，何来理性。在进化心理学的叙事里，比较被追溯为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我们的祖先必须在分秒间比较哪棵树上的果实更多、哪条路径的猛兽更少。在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核心动作正是在多个选项间比较边际效用。在这些大叙事里，比较不是众多认知技能中的一种；它是理性的原型，是逻辑的母体，是人类从混沌中提炼秩序的元动作。

然而，当代社会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象。比较从未如此精密、如此普及、如此高效——排名、分数、指数、KPI，无孔不入，无时不在——但恰恰在这个比较最精密、最高效的时代，人们谈起“比较”，越来越带着一股疲惫、焦虑和避之不及的情绪。一个人躺在床上刷朋友圈，看见别人的工作、旅行、家庭，他不是在进行比较，他是在被比较的惯性裹着往下滑。一个学生面对一份被精细标注了每一道错题对应哪个知识点、在全班处于什么百分位的成绩单，他不是在进行自我认知，他是在接收一份被预制好了的认知判决书。

对于这个现象，通常的解释路径是划分“好比较”与“坏比较”。说坏比较是攀比，好比较是自我参照；坏比较是只看结果，好比较是关注过程；坏比较是被动卷入，好比较是主动选择。这套话语在教育、心理咨询和大众话语中被反复使用。它的潜台词是：比较本身是个好东西，只是我们没用对。

近年来，一种更深刻的诊断开始浮现。其核心判断是：问题不在比较的频率或方式，而在于比较中那个最核心的认知动作——主动追问——被数字排名预先接手了。认知者不再需要亲自感受认知缺口、亲自撕开那个“说不准但不对劲”的瞬间，因为系统已经把缺口撕好了、问题问完了、答案递过来了。比较从一种需要主体亲自投入的认知活动，沦为是一套可以外包的认知服务。这种诊断在教育批判和数字文化反思中广泛存在，虽未形成某一学者的专属成说，但作为一种共享的诊断逻辑，它已经构成了对标准化评价最有力的批评路径之一。本文将其统称为“追问权诊断范式”[1]。这一范式将病灶定位在认知者与自己的追问动作之间，被插入了一个代理人。

但它仍然有一个未被动摇的先验：它预设了一个天然拥有追问能力的、等待被解放的主体。仿佛那个主体只是暂时被夺走了追问权，只要把追问权还给他，比较就能重新活过来。

本文要正面挑战的，正是这个先验。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当代比较危机的本质，不是追问权被预缴，而是比较者自身的比较发动回路被假肢替代了。假肢和缴械是两回事。缴械是你手里有刀，被人夺走了，夺回来还能用。假肢是你以为你还握着刀，但那把刀是你身体外面的东西——它替你完成“握”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握”的能力本身就在萎缩。当代数字排名和标准化评价的比较，不是夺走了认知者的追问权，而是给了他一套精密到不需要他亲自发动的比较假肢。他不是“不能比”，而是“有人在替他比，而这个替他比的人，他自己以为就是他自己”。

这个区分不是措辞上的微调，而是对病灶位置的一次根本性位移。追问权诊断范式把病灶定位在认知者与比较动作之间被插入了一个中间人——系统替人比了，所以人不用比了。本文把病灶定位在一个更深的位置：那个中间人不是插在认知者与比较动作之间，而是取代了认知者内部那个“我要比”的冲动发条。假肢不是在替人做比较，而是在替人产生“比”这个念头。一个人看到成绩单，他不是想“我要自己再想想哪里不对”，而是自动觉得自己已经比过了——因为排名的序列、知识点的标签、百分位的位置，这些都给他一种“我已经完成了比较”的完成感。这种完成感是假肢最致命的设计：它不禁止追问，它让追问变得没有必要。

由此，本文要命名的是一个尚未被既有理论单独切出的机制：比较假肢——一种外部预制好的比较结构，在其精密到足以替代认知者自身比较发动回路的时候，会从内部废止认知者发动比较的冲动本身，从而使比较从一种活的认知动作蜕变为一种戴在认知者身上却不再属于他的义肢。比较的形态跃迁，不是同一个东西死了，而是一组条件变了：比较从一种形态被发生成了另一种形态。其形式还在，比较者却不在了。

这里的“假肢”不是一个机械物的隐喻。它指的是一套被外部预制好的、能取代认知内在发动过程的感知-命名-反馈循环装置。这套装置由三个组件构成：替人感知缺口的公共标签系统（如“薄弱知识点”）、替人命名追问方向的诊断框架（如错题归类与难度标注）、以及替人决定什么算“完成”的反馈闭环（如正确率回升后的绿灯信号）。三位一体，它本质上是一个惰性的发生体——它自己不生发任何新的认知冲动，却能让认知者不再需要自己生发。

二、比较活着的时候：发动回路的解剖

要理解比较假肢如何从内部废止了比较的发动，必须先理解发动本身。比较活着的时候，它不是一台被外部指令触发的机器，而是一根从认知者内部自己拧紧的发条。这根发条由三个咬合在一起的冲动齿轮组成：亲感缺口、自命名冲动、闭合不耐。三者并非各自独立的零件，而是在每一次比较中一并发生；它们在假肢环境下的萎缩也不是逐一报废，而是三个齿轮咬合着的那个扭矩场整体性消失——一旦不再需要在涩感中悬停，不再需要自己把混沌挤成方向，不再需要抵抗过早闭合的舒适，整个发动回路就不再被点燃。

2.1 亲感缺口

比较的发动，第一个齿轮是感受到一个“说不清但不对劲”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可以用语言精确标识的缺口——如果是那样，它就已经是别人替你撕裂好的了。它是一种前语言的、模糊的、身体性的不适感。

必须将这一概念与既有认知冲突理论做出严格区分。皮亚杰的“认知失衡”指涉的是认知结构内部的矛盾——当新经验无法被既有图式同化时，系统进入不平衡状态，驱动顺应以重建平衡。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关注的是两个认知元素之间的不一致所引发的心理不适，其驱力指向不一致的消解。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中提出的“困惑情境”（perplexed situation），则是一个更接近的概念：思维从一种含混的、未定的、令人不安的情境开始，这种情境“令人困惑，因为它是不完整的、未决的”。杜威的困惑具有前反思的品质，这一点与本文的“亲感缺口”确有结构上的邻近。

但亲感缺口不同于困惑情境。困惑情境仍然是一种可以被公共描述的对象状态——“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境”这句话，任何人都可以说，困惑附着在情境本身之上。而亲感缺口的“亲感”二字，指向的是认知者身体性经验中完全私人、不可被他人指认的那一层。一个法学生读两个判例：一个判例中被告因紧急避险被免责，另一个判例中被告同样主张紧急避险却被判有罪。单看每个判例，他都能理解。但把两个判例放在一起，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涩感——好像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这种涩感不是判例里写着的，不是教科书标注的“重点难点”，甚至不是任何旁观者能从外部指认的“困惑情境”。它是他自己在把两个东西并置时，从身体里浮上来的。你可以被老师告知“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是杜威的困惑情境被公共化了。但你不能被告知你有一个涩感。涩感只能自己感受到。这不是一个认知步骤，这是一种认知冲动：在没有语言可捕捉之前，先有一种被什么东西轻轻刮了一下的感觉。

2.2 自命名冲动

亲感缺口是一团混沌的不适。比较要往前推进，必须把这团混沌变成一个大致的形状。这个“变出形状”的动作，是第二个齿轮：自命名冲动。

命名，在这里不是贴标签——那是假肢干的事。自命名是认知者亲自给那个涩感画一个大致边界：“不是判例的事实不一样——是法官对‘紧迫性’的解读尺度不一样？”这个问句还是疑问式的，还是试探性的，它还没有变成一个结论。但它已经把那个弥散的、说不清的涩感，挤压成了一个可追问的方向。这一步是无可替代的——它只能由认知者自己做出，因为它依据的不是可公共检索的信息，而是他自己感受到的那个涩感的质地。只有他自己才能判断，他画出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刚好切中了他感觉到的那股不对劲。

自命名冲动的反面，是接收命名。当一个学生在看到成绩单上写着“薄弱知识点：合同相对性原理”时，他没有经历自命名。那个缺口已经被系统用自己的语言命名过了。他接收了一个精准的、有用的、可直接转化为行动的名字。但他失去了自己把一团混沌命名为“我要往这个方向去摸”的那一步。这一步的失去，不是损失了一个步骤，而是损失了整个比较动作的发起——因为比较之所以能从被动接收

变成主动进入，全靠这步自命名把“有什么不对”转译成了“我要往哪追”。

2.3 闭合不耐

有了缺口，有了追问的方向，比较还要能持续往前推，不被过早的“我懂了”截断。这是第三个齿轮：闭合不耐——一种对过早闭合的本能抵抗。

很多比较在一碰就懂的地方就停了。系统说“你薄弱的是第三章第四节”，人觉得“原来是这里！”，然后去做那五道针对性练习，做完之后确认正确率提升了，觉得“我懂了”——比较结束。这种闭合是甜的：它从“我不知道我哪里不懂”的焦虑，滑入“我知道我哪里不懂了”的清晰。焦虑被解除，认知获得一个满意的终点，不再有继续追问的冲动。

但活着的比较恰恰是在这种“我懂了”的甜面前还能皱着眉。闭合不耐不是一种智力上的怀疑——“那个答案可能不对”，而是一种更原始的、身体性的不满足。它不是对答案正确性的不信任，而是对答案完成感的不接受。这里需要借助认知科学中关于“解释深度错觉”的讨论来更精确地刻画：研究发现，人们常常在获得一个表面解释后，错以为自己已经深刻理解了某个现象，直到被要求给出因果机制的详细说明时，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掌握了标签层面的知识。闭合不耐正是对这种“解释深度错觉”的本能抵抗——它不是怀疑答案，而是不信任那种“好像都通了”的完成感本身。一个学生知道自己在合同相对性上正确率低，他做完针对性练习，正确率上去了。系统说“你已经补上了这个知识缺口”。从外部考核标准来看，这事已经完了。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不对。我其实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之前老在这里出错。我这次只是知道该套哪个法条了，但我没有真正理解那个法条为什么在那类案子里容易用错。”这个声音就是闭合不耐。它不让人在第一个闭合处停下来，它逼人继续往下——不是往下解题，而是往下追问自己那个最初的涩感到底是什么。

闭合不耐与杜威思维五步中“推理”与“验证”环节有结构上的呼应，但功能不同。杜威强调的是思维如何向外展开检验，而闭合不耐指向的是一种向内的、对认知主体自身“懂的感觉”的持续不信任。它是一种对“认知闭环的舒适感”的不妥协。大多数认知活动最终都要闭合——要有一个结论、一个判断、一个可以据此行动的方案。活比较的活力，就在于它不轻易接受第一个闭合点。它反复追问：我真的懂了吗？还是我只是得到了一个听起来像是“懂了”的东西？这种追问不是怀疑论者的无限后退——它有一个终点，终点不在系统给出的正确答案，而在认知者自己不再感到那股隐隐的涩感。当一个学生说“我这次是真的搞懂了——我之前老出错，是因为我把‘相对性’理解成了一种外部关系，但它其实是合同内部的效力边界问题”，这个“真的懂了”不是因为他看了答案、他做过练习、他拿了高分，而是因为他自己命名了那个之前涩感的来源。闭合不耐驱动整个追问过程，直到认知者亲自抵达那个能让他自己满意的理解形态——不是被说服，是自己想通。

2.4 三个齿轮的咬合

这三个齿轮不是接力的关系——不是先亲感、再命名、再不耐——而是咬在一起的。亲感缺口一出现，自命名冲动就已经在暗中运作了（涩感本身已经是一个模糊的方向），而闭合不耐是让自命名冲动不被第一个碰到的“现成名字”截断的保障。缺失任何一环，发动回路的扭矩就不够把认知者从被动接收推进到主动追问。

这三个齿轮的咬合，就是比较的发动回路。它不是“追问权”——追问权是一个权利概念，指涉的是许可和外部约束。而发动回路是一个生成机制概念：它不关心外部有没有禁止你问，它关心的是你内部那个“我要问”的冲动还在不在。“追问权被预缴”的诊断范式，想的是枪被人收走了。本文的诊断是：枪还在你自己手里，但是扣扳机的那根手指，已经不再听从你内部那个“好像有点不对”的信号了。它听从的是系统发出的“这里不对，朝这打”的指令。

当学生拿到成绩报告，上面写着“薄弱知识点：合同相对性原理”时，他的提问冲动没有被禁止。他用不着问“我该往哪补”——报告已经告诉了他。他用不着问“为什么我错了”——报告已经给他归了类。他用不着问“我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被操作的定义：第三章第四节，正确率低于均值七个百分点。他的扣扳机一整套动作都被做完了，但不是他自己做的。站在他身体外面看，他是在执行一个改进计划；站在他身体里面看，他那个“我要自己摸一下那个不对劲”的冲动发条，根本没有被上过。假肢不是在替他执行“比”，假肢是在替他生产“比”这个想法。发动回路是人作为认知主体的“发生机”——它把“被给予的”转变成“自己发动的”。假肢关掉的就是这台机。

三、假肢的构造：替代如何发生

3.1 正面案例：第一次戴上假肢

在解剖假肢的结构与替代路径之前，必须先走完一个完整的案例——一个原本用自己的发动回路在比较的学生，是如何在系统性接触标准化反馈的过程中，被假肢完成那第一次置换的。

一个法学本科二年级学生，在上学期修读民法分论。他此前养成了一种自己称之为“摸脉”的习惯：读判决书时，如果觉得某一段跟自己预判的不一样，他会停下来，不往下看，先在本子上写一行字——“这里为什么不是按之前那个逻辑走的？”他不会马上查法条，也不问老师。他让自己在那个不舒服的涩感里待一会儿，直到能用自己的话把那团说不清的东西大致画出一个边。这是他的发动回路：亲感缺口被允许浮上来，自命名冲动被他自己执行，闭合不耐则表现为他不肯接受“反正判决就是这么判的”作为终结。

下学期开始，学院引入了一套智能学习诊断系统。第一次月考后，他拿到一份八页的成绩报告。报告第一页是雷达图：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亲属法四个模块，他在合同法的“相对性原理”子项上被标红——正确率低于均值七个百分点。第二页是错题归类：每一道错题被标注了配套的知识点编号、难度系数、建议重练的题库编号。第三页是进阶建议：“建议优先补强第三章第四节，预计需完成12道针对性练习。”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被剥夺了什么，而是一种精准的安心。这份报告解决了三个他最耗心力的问题：他不用自己摸着去找“到底哪里不对”——标签已经打好了；他不用自己琢磨“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归类已经做好了；他不用自己规划“下一步该做什么”——路径已经画好了。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了一句后来被他自己忘了的话：“终于不用自己瞎想了。”

此后两个月，他的学习节奏完全变了。每次练习后系统立刻更新他的知识点掌握图谱，他从“错在哪里”到“该补哪里”的整个过程被压缩到十分钟以内。他不再需要在本子上写那行“这里为什么不对”——因为系统已经替他写好了问题，只等他回答。到他面对期末考试时，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套节奏：收到反馈→定位知识点→做题→正确率回升→绿灯亮起。最终他的民法成绩提高了十个百分点。但他自己隐约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熟练的维修工，不是在理解法律，而是在清除故障灯。

真正让他感到不对的，是考试后发生的一件事。他在暑假旁听了一个模拟法庭。对方律师援引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判例，庭审结束后他试图自己在家把那个判例和上学期学过的几个相关判例放在一起比——他发现自己坐在桌前，大脑里是一片空白。不是他不想比。是“想比”这个念头发不出来。他等着一个东西告诉他“该比什么”——但那个东西不在。他打开电脑想搜一下那个判例的评析，但检索框里光标闪了五分钟，他不知道自己该输入什么关键词。他脑子里有上学期那套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的知识点编号——K-302（合同相对性）、K-407（第三人利益合同）——但这些编号没有一个能帮他撕开他此刻感到的混沌。他面对的是一堆没有被系统预先拆好维度的原材料，而他自己的发动回路，已经两个月没有被调用过了。它不是被禁止了，而是被绕过了——每一次都被绕过了，以至于它不再自动跳出来。

这是一个完整的替代案例。

3.2 反面案例：假肢为什么没能戴上

但假肢的生效并非无条件的。本节补入一个同样真实的对比例，用以展示：当认知生态中存在某种结构缝隙，它要求认知者必须亲自在涩感中悬停时，假肢的替代就无法完成“篡改感知”这最后一步。

同一时期，另一名同样使用该智能诊断系统的法学学生，同时参加了一个小型案例研讨课。这门课不设标准答案，期末考试是一份未公开的判决书草稿，要求学生在无任何外部资料的情况下，写一份“你认为这个判决哪里不对”的分析报告。教师在每堂课随机点名让学生做五分钟开场陈述，陈述内容既不能复述案情，也不能背诵法条，只能讲“读完这个案子，你觉得最别扭的是哪一段”。换言之，教师强制要求学生每周至少一次，在没有任何标准维度可依凭的情况下，开口说出自己的涩感，并试着给它命名。

这名学生在使用成绩报告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摸脉”习惯——因为每周的研讨课都在给他反复练习那个悬停的动作：读判决，停下来，感受哪里不对，在不确定中试着画出一个追问方向。当他在期末面对一个陌生判例时，他不需要等什么告诉他“该比什么”——他自己就能感到涩感，自己就能给涩感大致命名，自己就能推着追问往前走。他的发动回路没有被假肢废止，不是因为他不使用假肢，而是因为他每周都被逼着走那条不能绕开发动回路的苦路。

这里的生成层面的意义是关键的。假肢的替代不是“使用假肢”就必然导致的。它是一个需要全面认知生态配合的过程。只要认知者的认知生态中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缝隙——那种不容许他用接收标签替代自己悬停的情境——假肢就无法把他“不想比”篡改为“我还在比”。这个反面案例不是为了展示“如何抵抗假肢”，而是为了反证假肢生效的精确条件：只有当涩感悬停被系统性地从认知过程中删除时，发动回路才开始从内部萎缩。

3.3 假肢的两层结构

比较假肢不是一块简单的铁片，它是一套装置。这套装置由两个层级的替代构成：第一层叫“缺口感知替代”，第二层叫“发动情绪替代”。两层加起来，完成的不是“帮人比较”，而是“替人变成一个比较者”。

3.4 缺口感知替代：把涩感换成标签

人发动比较的第一推动，是在两件事物并置时感到一种可以觉察的不适——一个法学生读两个判例，心里浮起一种说不清的涩感；一个手艺人摸一下今天烧的陶罐，和昨天那只放在一起，手指上传来一种微妙的差异。这种涩感、这种差异感，不是任何一个外部系统能替你生成的。它长在人的身体里——长在他对这件事物长期浸染后养出来的那种感受力里。

数字排名系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种私人涩感替换成一个公共标签。系统说：“别自己觉得哪里不对了，这就是不对的地方——你的合同相对性原理正确率低于均值七个百分点。”它给的不是一个方向——一个需要认知者自己去摸的方向——它给的是一个已经命好名的、精度极高的、可以直接被采取行动的缺口。从功能上看，这当然是高效的：认知者少走了弯路，直接走到了缺口面前。但从发生上看，这个直接走过去的动作跳过了最关键的一步——那个缺口是自己感觉到的还是被人指认的？如果是被人指认的，那你的“感觉到”这个能力，在这一次比较中，并没有被使用。你只是接收了一个感觉的替代品。当你长期使用替代品时，你自己的感觉器官不是在变钝——比变钝更糟——它是在变得不被需要。一个不被需要的器官，不是坏了，是被身体从内部分解掉了。一个人长期使用导航走路，他不是不识路了，他是“识路”这个动作不再出现在他走路的时候。他的方向感不是因为退化而变差，而是因为没有被调用，而不再发动了。

3.5 发动情绪替代：把探索的不适换成满足的舒适

假肢的第二层替代，比第一层更隐蔽，也更致命。发动认知比较最初的那种情绪，是一种轻微的不适、不安、想弄清，它是一股把人从认知的舒适区往外推的冲力。这个冲力来自亲感缺口的不舒适。而当假肢用一个精准标签替代了亲感缺口后，假的缺口还附带了一份回赠：一份让人立刻从不舒适中解脱出来的“满足感”——系统告诉你该补哪里，你可以立刻行动。于是，你不但获得了方向，还获得了一种事情已被办妥的安定感。这股安定感，取代了原来的探索冲动，成了整段“假肢化比较”的主导情绪。

回到上述法学学生的案例。他第一次拿到成绩报告时感受到的“精准的安心”，就是这层替代的临界点。那晚他日记里的“终于不用自己瞎想了”，精确地记录了他从发动回路使用者转变为假肢佩戴者的瞬间。他不是被贬低了，不是被剥夺了什么；他是被解除了一个负担——那个负担叫“自己摸”，那个负担叫“不知道往哪儿走”。假肢让他从一个焦虑的探索者，变成了一个高效的操作者。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在拿到详细的成绩分析报告后，会觉得安心。他不是在进行比较，他是在接收一个比较的结果。但这个结果给了他一种“我已经完成比较”的完成感。这种完成感比焦虑舒适太多了——它让他立刻从“我不知道我哪里不懂”的焦虑中跳进“我知道了我哪里不懂”的清晰。但这份清晰是假的。它不是从他自己的认知里长出来的，而是从系统里下载下来的。安心的不是他的认知得到了推进，安心的是他的焦虑得到了解除。这是假肢最精巧的设计：它把认知活动从一场对自己发起的追问，变成了一种对外部服务的消费。消费是甜的。追问是苦的。当一个人习惯了用甜的方式获得“我懂了”的感觉，他就越来越难忍受受苦的方法。不是因为苦太难，而是因为他不理解为什么还要去吃苦——那条过去他觉得必须一步一步走上来的长坡，现在已经有了直达电梯。电梯不光是快，它还舒适、稳定、每一个到达的楼层都有清楚的标识，电梯里没有人因为迷路而感到窘迫。一个长途跋涉的精力竭者，站在这部电梯面前，他需要的是意志力吗？不。他需要的是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东西——他需要记得，脚踩在泥土上的感觉，曾经对他来说不是负担。

3.6 替代的三步路径：绕过→遗忘→篡改感知

前两小节解剖了假肢的两层结构。本节回答那个最关键的生成机制问题：假肢是如何从“一次捷径”变成“唯一的路”的？这个过程不能被简单地归为“习惯化”——习惯化只是重复的累积，解释不了为什么认知者最后会把自己的假肢感知为自己真正的比较动作。替代的完整路径需要三步：绕过、遗忘、篡改感知。

第一步：绕过。第一次替代发生在那个认知者最脆弱、最容易被递上礼物的时刻——他在亲感缺口的涩感里悬停着，还没自己走出来。亲感缺口不是舒服的状态。它是一种低度的认知不适，人本能地想要解除它。在假肢没有出现的世界里，解除它的唯一办法是自己走完完整段发动回路：从涩感到自命名，从自命名到追问，从追问到闭合不耐的反复捶打，直到自己觉得真的想通了。这条路苦，而且没有保证——你走完了也不一定有答案，你只是更靠近了那个答案。假肢来了，它说：“你不用走。你看，问题出在这里，路径是这一条，你再做十二道题，灯就绿了。”这条路甜，而且有保证——精准到个位数的正确率预测，你做完就知道自己“补上了”。在那个悬停时刻，假肢完成了第一次绕过：不是认知者选择了假肢，而是假肢在认知者还没来得及做出选择之前，就已经用一份更快的、更甜的、更有保证的答案，截断了那个本应继续往前摸的动作。

这一步不能单靠一次绕过就完成替代。假肢需要反复供给——每一次认知者面对成绩报告、精准反馈、智能诊断，悬停-绕过的循环就被加固一次。不是一次性的截断，而是在数十次、数百次的反复给糖中，原来的苦路逐渐变得不再可见。这就是替代的第二步：遗忘。十次、百次之后，那个“在涩感里悬停-自命名-不耐推着继续摸”的完整经验，不再出现在认知者的认知历史里。他不是“记得那条苦路但选择不走”，他是那条路已经不在——不是路径被拆掉了，而是通向路径的那个入口，那个在涩感里停下来悬停一下的片刻，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杂草长满，他不再认出那是一个入口。他不知道自己曾经有一根从内部自己拧紧的发条。假肢不是禁止他回忆，假肢是让回忆的对象本身消失了。

但最重要的一步，是第三步：篡改感知。仅仅绕过和遗忘，仍不足以解释认知者在面对“你是不是已经不会自己比了”的质问时，那

种真诚的困惑和否认——“我怎么会比？我每天都在看数据、分析差距、制定计划，我比以前比得更多、更好了。”这个回应不是狡辩。它是真实的。认知者确实每天都在“做比较”——他接收标签、定位缺口、执行练习、确认绿灯亮起，这一整套动作都在他的意识中运行，他是这一连串动作的执行者。问题在于，他对“自己在比较”的判准本身，已经被假肢悄悄换掉了。他原本的判准是内源的：有没有亲感涩感？有没有自己命名？有没有用自己的闭合不耐推到底？假肢给了他一套新的、外源的判准：有没有查看数据？有没有发现差距？有没有完成针对性的修正练习？这套新判准更容易被满足、更容易产生完成感、更容易让他对别人（以及对自己）说“我已经比过了”。当他用这套新判准来感知自己的认知活动时，假肢就完成了它最深的一次藏身：它不再是一种“别人替我做的事”，它变成了“我自己做的事——我对自己的认知进行有效管理”。篡改感知不是认知者变笨了。是他的“我”和“比”之间的那个等号，被一根假肢悄悄焊住了——他以为自己在亲自动作比较，其实他是在高效地运行假肢。这一步是冲动替代的生成机制枢纽。假肢至此才真正戴稳。

四、“比较假肢”的不可还原性：它不是谁的替代说法

前三章完成了本文的正向命名：比较假肢是什么，发动回路如何被替代。在与最近邻理论的交锋中，本章将用六重区分划出这个概念独有的辨别面——那是一个此前看得见却说不出、没有任何现成词能单独装下的裂隙。六重区分中，与斯蒂格勒“代具”的区分是绝对重心：它是唯一在“替代”这一存在论层面与本文相邻的对手。其余五重区分，从追问权到误识，本质上共享一个共性——它们都切到了“功能替代”的层面，但切不到“冲动替代”的发生层。本章将以斯蒂格勒之墙为轴，其余为辐。

4.1 不是“追问权被预缴”

追问权诊断范式，把问题定位在外部权力对主体内在追问冲动的占有与替代。它的叙事主人公是一个本来拥有完整追问能力的人，他的“追问权”因为系统的过度接手而被剥夺。这一范式在教育批判、数字文化反思中有着广泛的理论回声——从对标准化考试剥夺学生问题意识的批评，到对算法推荐系统侵蚀用户主动探索能力的担忧——尽管这些批评并不共享同一套术语，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判断：系统替人做了本该人自己做的事，人因此失去了做那件事的机会。

本文的看法不同。可被缴走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你自己的。一把能被别人从你手里夺走的刀，你丢的是武器；一条能被精密系统直接替换的差距感知回路，你丢的是器官。假肢在替你走路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缴你的械——械在你自己手里，只是你的手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握它了。“追问权诊断范式”只说出了第一层（东西被夺走），没说出的第二层是夺走的方式：它是让你自己不再认出那个东西原来是你自己的。学生对成绩单的“安心”不是被说服的，是被“满足”掉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追问权”本身作为一个批评概念有其独立的法政与教育价值——它指向的是认知正义、参与权利与制度公平等重要议题。本文无意否定这些议题的意义。本文要论证的是：在认知发生的层面，权利是外部保障，冲动是内部发生。假肢时代的真正困境，不在于追问权被剥夺（即使法律完美地保障了追问权），而在于冲动发生条件的流失——一个人可以拥有追问的权利，却不再拥有追问的冲动。两者不在同一个分析层面，也不互相取消。

4.2 不是“认知外包”

认知外包这个概念，说的是人把一部分认知任务——记忆、计算、导航——交给外部工具，工具是人脑的延伸和替代。导航替你认路，计算器替你算数，搜索引擎替你记住知识。

但认知外包的逻辑是器官延长：工具替你做事，你自己的器官还在，只是暂时不用。假肢的逻辑是器官置换：工具替你感觉那个缺口，替你觉得“比完了”，你那个自己感觉冲动冒头的器官本身就不再运转了。外包卸掉的是执行，假肢卸掉的是发动。一个用导航的人，关了导航，他可能迷路，但他不会失去“我要找路”这个念头。而一个长期依赖成绩单来知道自己哪不会的学生，你拿走他的成绩单，他最常出现的是什么？他不是急得团团转拼命想“我得自己找找哪里不会”，他是茫然地坐着，不觉得自己需要做什么。“找找哪里不会”这个认知发条，是被假肢悄悄拧掉的那根簧——它不是被能力限制住，它是没有被点燃。

4.3 不是“规训”

福柯的规训理论已经讲清楚了标准化比较如何把主体做成可度量、可排序的对象。本文与福柯的邻近性是诚实的：两者都承认数字排名是一种权力。但两个人切的问题不一样。福柯问的是：这套权力把人做成了什么？本文问的是：这套权力让人不再能对自己做什么？

有一种可能的质疑：福柯后期发展的“自我技术”概念，已经描述了主体如何在权力提供的话语和实践中对自己进行操作。一个被规训的学生，早已不是那个排名的被动受害者——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查成绩单、自己制定改进计划、自己给自己划定“薄弱知识点”然后主动去补。这难道不正是“主体对自己做事”吗？如果福柯的框架已经延伸到了这里，那本文的假肢与自我技术有何不同？

这个质疑切入问题的要害。福柯的自我技术，核心在于主体借用外部提供的模式、话语、规范，对自己进行塑造——它的来源在外

部，但操作的动作是主体自己完成的。本文的比较假肢在此基础上多划出了一道更细的线：它区分了主体对自己做的操作，是从自己内部那团说不清的涩感里发动的，还是从系统预制的感知缺口里移植的。一个用成绩单来“自我治理”的学生，他对自己做的操作——查报告、做题、确认绿灯亮起——每一步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但那个操作的起点，那个告诉他“该往哪做”的感知缺口，不是他自己感受到的；是系统撕好了、命好名了、递到他手里的。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做事”和“别人对自己做事”的区分，而是“自己对自己做事的那个发动源头在哪”的区分——源头在你自己身体里那团涩感，还是在系统替你预制好的那个“薄弱知识点”标签里。这条线，福柯的自我技术没有画，因为它不追问发动的来源，它只追问操作的模式。规训的重心在“制造一个合格的主体”，假肢的重心在“使主体不再从其自身内部发动认知行为”——二者的交汇点在“被冒名”：规训制造的那个对自己进行治理的比较者，和那个在假肢上安然漫步的比较者，外表完全一样，都在查排名、补短板、规划下一步。但内核塌陷处不同：前者是在权力提供的话语中学会对自己做事，后者是从内部没了做事的发动。

4.4 不是“系统1替代系统2”

这个区别最需要讲清楚，因为从表面看太像了。卡尼曼的系统1与系统2区分轴是认知加工的快与慢、自动与控制。一个被预制好的排名比较看起来就是系统1：它不费力地弹出一个已知的差距信息，认知者迅速接收，不需要慢慢分析。但这不是本文切开的轴。

本文切开的轴，是“这个判断的动作是谁做的？”一个费力的、仔细填写标准化测评量表的人——他在认真想每一道题的得分代表什么，他写了很长的反思——他看起来完全在系统2里运作。但他仍然可能是在假肢上。因为量表的结构已经预设了“什么值得比”和“差距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在被预先设置好的维度格子里认真填内容。他的发动是被量表触发的外部指令，而不是一个从自己内部某个说不清的涩感里长出来的追问冲动。反过来，一个看似“系统1”级别的瞬时判断——手艺人摸一下两件器物，说“这件活”——这个动作几乎没有时间。但他用的不是假肢。因为那个判断是从他自己的身体感受里直接涌出来的，缺口是他自己的指尖亲感到的，命名的方向是他多年经验在瞬间完成的自命名，闭合不耐则隐在那句不肯多说的简短话语里——“这件活”就是这件的唯一判定，不解释，不游说。假肢和真肢的区别，不在反应的快慢，在发动的来源。

4.5 不是“第三持存／无产阶级化”——概念分离的主战场

这是本文最重要、也必须最充分地展开的一节。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已经系统论证过：技术不是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第三持存（外化的记忆载体）不是中性的记录，而是对人类认知本身的替代与重构。他的“无产阶级化”概念描述的正是核心过程——外部技术器官替代了人的内在认知动作，导致个体“知道怎么做”的能力从身上剥落，成为被技术系统掏空的存在者。他的核心比喻就是“代具”——一种替代性的外在器官。如果斯蒂格勒已经在一般意义上论证了“技术代具替代人的认知能力”，那“比较假肢”是否只是把斯蒂格勒的理论套到了比较这个具体领域？

本文的立场是明确的：不是。因为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理论，当它被推向极致时，无法产出“比较假肢”所揭示的那个最核心的现象——假肢下的主体体验到的不是痛苦与挣扎，而是一种被甜美的确定性解除焦虑后的“安心”，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想再自己比”的深层舒适感。

斯蒂格勒笔下被剥夺技能的工人，他的“痛苦”和“挣扎”本身就是冲动仍在的证据——他失去了“怎么做”，但他仍然“想要做”。流水线夺走了他的手艺，但他仍然想要做出一件好东西——那个意图来自他自己。他的无产阶级化是功能层面的：技能被剥离，但欲求的发动结构仍在。而本文的假肢下的主体，在接收“薄弱知识点：合同相对性原理”这一精准标签时，体验到的是认知焦虑的解除——“终于不用自己瞎想了”。他不是痛苦于自己的比较能力被剥夺了，他是舒适于自己不再需要发动那个比较能力了。他的功能没有被剥夺——他仍然可以在系统给出的维度格子里认真比较——但他的冲动发条被那份舒适感从内部拧松了。

这就是两者的分离点。斯蒂格勒的理论可以在“功能替代”的框架内处理一切技术代具对人做的事。但他无法独立产出这样一个判断：当代最精密、最高效的比较技术，其最根本的改造力不在于它“替人做了比较”，而在于它通过提供一种比亲自比较更舒适、更确定、更不费力的替代体验，从内部废止了认知者“想要自己比”的冲动本身。功能替代的主体仍然在“想要”，冲动替代的主体不再“需要”。斯蒂格勒的主体是被掏空了技能但仍有欲求的存在者。本文的主体是在欲求还没成形之前，就已经被一份预先递上来的满足感消解了那个欲求的发生条件。这不是无产阶级化，这是发动回路的替代。无产阶级化是一个分析技能流失的框架；比较假肢是一个分析冲动如何被废止的框架。前者问的是：你还知道怎么做吗？后者问的是：你还需要做吗？一个是手没了，一个是心不跳了。

至此，本文与斯蒂格勒的分离点已经画出：代具替代的是“功能执行”，假肢替代的是“冲动发生”。这两者处在不同的发生层面，不可互相还原。

4.6 不是“误识”／不是“支架依赖”——两笔快速廓清

与布迪厄“误识”的区分，要点在于发生深度。“误识”描述的是个体将社会性的分类与排名内化为自身的认知范畴，从而将外在支

配误认为自然秩序——“我就是不擅长数学”。这里，主体仍然完成了一次“内化”的动作。他确实“认”了，只是认的内容是错的。他形成了一个关于自己的信念，尽管那个信念是虚假的。

而比较假肢的发生深度更浅——或者说，更根本。假肢化的接收越过了“内化”这个动作本身。认知者不形成关于自己的错误信念——“我是合同相对性薄弱的人”——他直接接收了一个操作定义（“正确率低于均值七个百分点”），然后按指令行动。他没有“认错”任何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进行“认”这个动作。信念层面的操作被跳过了，直接进入了行动层面。误识是认知的扭曲，假肢是认知的悬置——它让人不再需要形成关于自己认知状况的任何信念，因为系统已经替他管理了所有需要信念来驱动的决定。

与教育研究中“支架依赖”概念的区分，则指向另一个方向。支架依赖描述的是：学习者在长期获得结构化支持（如提示、框架、分解步骤）后，一旦撤去支持便无法独立发起学习行为。它的关键词是“不能”——撤走支架后，行为消失了，因为能力没有在支架撤除过程中被内化。而比较假肢的关键词是“不想”——不是撤走系统反馈后学生“无法”自己找问题，而是在系统反馈还在运转的时候，他“不再觉得需要”自己找问题。两者的区分不只是措辞的微调。支架依赖是一个功能层面的概念：它关心的是独立执行的能力是否被养成。比较假肢是一个发生层面的概念：它关心的是发动冲动的条件是否被废止。“不能”和“不想”的区别，就是“比较假肢”能否从教育心理学的既有概念中独立出来的分水岭。如果“不想”只是“不能”的心理表现，本文的理论就塌回了心理学。本文要论证的恰恰是：在假肢化比较中，“不想”先于“不能”发生——认知者不是失去了自己比较的能力，而是那个“我要自己比”的念头，在精密系统的温存服务中，再也没有被点燃过。

这六重区分——追问权、认知外包、规训、系统1/2、代具、误识（附支架依赖）——共同指向一个此前没有被任何一个理论单独命名的辨别面：不是外部夺权、不是任务外包、不是权力塑形、不是快慢切换、不是技术代具论的功能替代，而是发动回路的冲动替代。这个概念是本文的理论贡献。

五、假肢的效力条件：普适、客观、自动如何联手封锁发动回路

假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由三种现代认知评价体系被广泛推崇的特性——普适、客观、自动——在特定条件下配比而成。这三种特性每一种看起来都无可挑剔：它们让比较变得更公平、更可靠、更省力。恰恰是这些被追求的美德，在它们的极致形态中，联手构成了一套不再需要认知者自己发动的比较服务。这不是对这三种特性的道德审判，而是对它们作为发生条件的分析：普适削掉了私人涩感，客观藏起了价值判断，自动填平了所有发动冲动所需的间隙。三者不是各自独立的“配料”，而是在协同作用中从三个方向同时挤压了发动回路的三个齿轮——当一个方向上“不需要自己感觉缺口”，一个方向上“不需要自己做出判断”，一个方向上“不需要自己经历认知过程”，发动回路就不再有一个结构性的空隙可以容身。

5.1 普适：把口味做成菜单

假肢的第一种效力条件是普适。普适的逻辑是：一个比较的框架如果能适用于所有人，它就更公平、更科学、更有解释力。在不同的人之间使用同一把标尺，这是标准化评价的根基。但普适的生成机制代价是，它必须把比较中所有只属于一个人的东西削掉——那个法官在读到某个案情描述时心里轻轻动了一下的那个东西，那个学生看到一道题时想到自己昨天刚跟父亲吵过一架、那个情境忽然在他心里泛起一股涩味的那个东西——这些私人感受，不能被编入标准的比较维度里，因为它是不可携带、不可排名、不可追责的。

普适的比较框架，本质上是一套“菜单”。它告诉你：这些是你可以比的东西，这些是你应该关心的维度。它没有禁止你在菜单之外自己品尝，但它把菜单之外的东西从“比较”这个动作的合法空间里排除出去了。久而久之，人们在比较的时候自动看向菜单，不再问自己：“我尝到了什么菜单上没有的东西？”普适从源头上挤压了亲感缺口的空间——因为亲感缺口本身就是“菜单上没有的东西”，就是那个不能被公共标签提前命名的私人涩感。

5.2 客观：把味道做成成分表

假肢的第二种效力条件是客观。普适是把私人口味全域化，客观则是干脆把口味蒸发掉，只留下数字。它说：我们不要你“觉得”这东西好不好，我们要测出它“实际上”有多好。排名的数字、分数、百分位，都披着“客观”的外衣。它们不表达任何人的主观意见，它们是事实。

但这个事实有一个被藏起来的步骤。数字之所以能取代私人口味，不是因为它把私人口味变成了公共事实，而是因为它把“价值判断”这个动作整个儿改成了“信息接收”。一个人说“这所大学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它在表达判断者的感知和偏好。而说“这所大学排名第10”，这是一个信息陈述——它看起来没有判断者在里面。但“排名第10等于好”这个等式，本身就是一套被嵌进数字里的价值判断。客观把这一层裹起来，让认知者以为自己只是接收了一个事实，而没意识到他在接收一个事实的同时，也已经接收了一套判断标准。

当客观到了极致，它能制造一种奇怪的效果：认知者觉得排名不是任何一个活人做出来的判断，而是“数据自己说的”。这时候，客

观就不再是一个值得审视的标尺，而是一个不需要被怀疑的自然事实。假肢在此刻完成了它最深的藏身：这不是一个别人替我做的判断，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判断”——这是一个事实。对一个事实，有什么好追问的？客观挤压的是自命名冲动——如果缺口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我要往哪个方向去摸”这个命名动作就从内部被跳过了：方向已经写在客观数据里了。

5.3 自动：把厨房从家里搬走

假肢的第三种效力条件是自动。一个人过去要发动比较，需要他自己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自己去感受那阵涩感，自己去命名，自己反复咀嚼直到闭合不耐消退。这是一个完整的、由他主动发起的认知过程。自动把这整个过程替他包办了。数据自动采集，排名自动更新，诊断报告自动生成，薄弱知识点自动标注，推荐练习题自动推送。

自动取消了比较中的一切“费力的间隙”。那些间隙正是先前发动回路的容身之处：它需要你停下来感受一下、想一想、不舒服一下、再往前摸一步。自动把这每一个“一下”都用即时推送的信息填满。你不必停下来感受，因为下一个信息已经到了；你不必觉得不舒服，因为你已经被告知了该做什么；你不必往前摸，因为路径已经规划好了。自动让你永远有事可做，却永远不必做自己的事。自动挤压的是闭合不耐——因为自动化的反馈循环本质上就是一个完美的闭合机器：问题出现-系统定位-行动执行-结果确认-绿灯亮起，一个完整的比较周期被压缩成了一次无摩擦的操作。没有缝隙，没有悬停，没有那个“我是不是真的搞懂了”的不适感可以生长的空间。闭合不耐不是在抵抗闭合，而是根本没有被触发。

5.4 三力合一：不再有结构性的容身之处

普适、客观、自动，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不只是三个独立问题的叠加。它们协同作用的方式是：普适从输入端封死了私人涩感的合法性（“你的个人感受不能作为比较的标准”），客观从中间层封死了自命名的必要性（“差距是由数据客观呈现的，不需要你来命名”），自动从输出端封死了闭合不耐的可能性（“任务已经完成，绿灯已经亮起，你觉得还需要追问就是你的问题了”）。三个齿轮的每一个都在结构上被对应封死，整个发动回路不再有一个可以运转的扭矩场。

这套装置不凶，不强迫，不禁止你思考。它只是让所有需要你亲自发起的东西，都已经有一个替你发起的版本——更方便、更清晰、更不费力。假肢的效力，恰好在于它实现了比较评价体系长久以来追求的那三件事——而那三件事联手的结果，是在认知者内部制造了一个完美的替代闭环。

六、反驳与回应：假肢只是提高了认知起点？

一个强论证必须正面回应最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本文的核心因果主张是：假肢化的比较体系会导致发动回路的不可逆废止。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反对者可以提出如下替代解释：

学生拿到成绩单后的“安心”，不是假肢的麻醉，而是一种合理的认知效率的提升。他不必重新发明轮子——不需要在每一次学习中都在混沌中重新摸索“哪里不会”，他可以用系统给的诊断作为起点，迅速定位问题，然后再进行更高阶的比较。他省下的那部分心力，可以被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比如在系统标定“合同相对性原理”薄弱之后，他可以用省下的时间去深入比较不同法官对该原理的不同解释路径。这不是发动回路的废止，这是发动回路的起点提高：他从“自己摸到问题”变成了“从系统导航到问题，再自己深挖”。

这个反对意见是严肃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完全自洽，而且在实证上不能被轻易排除：确实有大量学生使用智能诊断系统后，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提升。如果这个替代解释成立，本文的“假肢导致发动回路废止”的强因果主张就不过是一个过度悲观的叙事——假肢并没有废止发动回路，它只是把发动回路从低级的“识别缺口”迁移到了更高级的“深度追问”上。

本文的回应不采取“三层拆招”的分散策略，而是用一个核心的存在论判断来收束：这一反对意见之所以看起来成立，是因为它没有审查自己对“比较”的判准本身。当认知者对“在比”的判准本身，已经从亲感裂隙的发现，悄然置换为排名的接收、处理与消除时，他就不是在把同一个发动回路用得更高效，而是把“比较”作为动词的词根换掉了。假肢化不是让发动回路的起点变高，而是让认知者把假肢的循环，错误地感认为发动回路本身。

展开来说：系统导航下的深度追问——比如比较不同法官对相对性原理的不同解释——确实可以发生，也确实可以有真正的认知价值。但它依赖于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前提：学生必须先从自己内部感觉到“这个解释和那个解释之间有一个我还说不清的差异”，然后才能去追。如果他长期的认知经验是“缺口由系统告诉我”，那么当他面对两个法官的不同解释时，他更可能做的不是自己感觉到差异，而是等待一个标签告诉他差异在哪里。他也许会自己查书、分析、写比较报告——这些动作他都可能做。但他的追，起点不在他自己身体里的那个涩感，而在系统为他提供的那个问题框架内。假肢没有废止他“做事”的能力，但假肢可能已经废止了他“自己发现事”的冲动。这不是心力的节省再分配，这是发动回路本身不再被调用的结果——省下那段心力的调用回路，不是被暂存在某个地方等待高阶调用，而是因为长期不被调用，已经不自动跳出来了。

“自己摸到问题”和“从系统导航到问题”看似只是起点的不同——终点都是到达问题，但这个起点的不同，影响的是认知者与问题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当一个学生自己从一团混沌的涩感里摸到一个追问方向时，他不是“识别一个问题”——他在完成一次从无到有的认知发生：他的身体先于他的语言感到差异，他的自命名冲动把这份差异从混沌里挤出一个形状，他的闭合不耐逼他把这个形状追到最深处。这一整套过程，训练的并不是“识别问题的能力”，而是“从混沌中从无到有生出问题的能力”。这道能力的训练场，正是那个在涩感中悬停的、不被现成定义拯救的时刻。当系统每次都在这个时刻递上标签和路径时，学生确实节省了心力，但他省下的，恰恰是那个唯一能把“生出问题”这道发条拧紧的负重训练。一个长期不做负重训练的人，他的肌肉不是在休息，而是在萎缩。

实证上的原则性检验可以这样设计：假肢化群体在面对全新的、不能由系统预置维度的陌生问题时，其自主发动比较的能力是否等于或优于非假肢化群体？如果能够在严格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观察到这个结果，本文的核心因果判断即告证伪。这一检验的关键在于“自主发动比较的能力”的操作化——必须是在不提供任何预置比较维度、不给予任何排名反馈、不给出任何指标评价的开放情境下，认知者面对一个新异而含混的、需要被比较理解的任务时，他能自己察觉到“哪里不对”、能自己命名追问的方向、能在没有外部反馈时持续追问。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长期假肢化群体的表现显著弱于那些在认知生态中保留有“必须自己悬停”结构缝隙的群体——如第三节中那个始终被研讨课逼着开口说出自己涩感的学生——那么本文的判断就不仅是逻辑上自治的，而且是原则上可被事实击穿的。

假肢确实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提高认知效率，而这也正是假肢最难以被批评的地方——因为它确实有效。但本文的论域不在“假肢是否在所有条件下都有害”，而在“假肢是否在一种特定的、极为重要的认知能力——自主发动比较——上制造了不可逆的废止”。“假肢只是提高了起点”这个反对意见要想彻底驳倒本文，必须证明：长期依赖外部预置比较框架的群体，在开放性创造情境中的“从无到有生出问题”的能力，并不逊于保留有“自己摸缺口”经验的对照组。在当前可见的实证研究中，有大量的间接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长期依赖结构化反馈的学生在开放情境下提问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显著偏弱，这一现象在教育研究中被广泛讨论，常被概括为过度支架化导致的自主性学习衰退。当然，这一证据尚不构成对本文核心判断的严证实证，但它足以表明：认为假肢只是“提高了起点”而不付出发动回路代价，这个乐观叙事过于轻巧。

七、重新问“谁在比”：概念的意义与边界

7.1 概念的意义

本文提出的“比较假肢”，不是对既有比较理论的修正或补充。它是一个存在论层面的位移——把问题的焦点从“比较的公正性”“比较的焦虑”“比较的追问权”这些外部变量，移到了比较者内部那个发动回路的存亡。

这个位移带来三重新的看见。

第一，它让人看见“比较的形态跃迁”不是比喻，而是机制。人们在说“比较让人疲惫”“比较让人焦虑”时，用的是一种症状描述。“比较假肢”命名的是症状之下的病灶：不是比较让人累，是假肢化的比较不需要你了，你还在跑，但你已经不是一个跑者了——你是一个被跑步机带着移动的人。跑步机的速度比你快，你看起来也在跑，但你的跑已经不是你自己发动的了。你感觉累，不是你跑得太多，是因为你一直在跟一台不需要你发动的机器同步，而你的身体一直在试图重新拿回自己的节奏。

第二，它让人看见“标准化评价的代价”不在公平层面，而在主体性层面。一向以来，对标准化评价的批评集中在它的不公平——它对不同背景的学生不公，它窄化了教育的可能性，它制造了应试焦虑。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它们都还停留在公平与效率的框架里。比较假肢的批评切在另一个层面：即使标准化评价能做到绝对公平，它仍然会从认知者内部废止比较的发动回路——因为它不需要认知者自己感受缺口。“公平”是分配层面的事，“发动”是存在层面的事。一个绝对公平的假肢，仍然是一个假肢。

第三，它让人看见“追问”不是权利，是冲动。追回追问权，是向外部夺回被剥夺之物。追问权也许可以被夺回——拆掉排名、不许比较、回归定性评价。但夺回了追问权，不等于追回了追问冲动。那个冲动是由亲感缺口、自命名冲动、闭合不耐这三个齿轮咬合成的一根发条。发条不需要权利来保护它——它需要条件来点燃它。权利可以被立法恢复，冲动不能。假肢时代真正的困境，不是人不能问，而是人不想问——因为“想”这个动作的发生条件，已经被假肢的精密填平了。权利是外部保障，冲动是内部发生。当一个认知者拥有完美的追问权利却不再有任何追问冲动时，他在认知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是一个比较者。

7.2 概念的边界：证伪条件与假肢失效的结构缝隙

任何概念都必须给出自己被事实击穿的条件。本文不自外于此。同时，任何概念也都必须给出自己的边界——在什么条件下它不再生效。这两件事，可以在同一个分析中完成。

本文的核心因果判断是：长期使用精密预制比较系统的群体，其自主发动比较的能力会发生不可逆的废止。这个判断在如下条件下可以被证伪——

第一，若在一个长期运转的假肢化比较体系（如精细化智能学习反馈系统）中，能找到一个群体，其成员在持续使用该体系超过一定年限后，在面对一个全新的、不在此系统预设维度之内的陌生问题时，自主发动比较的能力——包括能自己察觉到“哪里不对”、能自己命名追问方向、能在没有外部反馈时持续追问——不仅没有退化，反而显著优于一个长期不使用任何比较工具、完全靠自己摸索的对照组，且该效应不能被其他变量解释，则本文的核心因果机制被证伪。

第二，若在跨文化研究中，发现某个文化群体的认知训练全程高度假肢化（标准化比较、数字排名、自动化诊断报告高度普及），但其成员在需要从混沌预感中逼出新问题的创造性领域，产出密度与原创性系统地高于那些评价系统更模糊、更依赖个人自主判断的文化群体——则本文的核心判断需要被修正：假肢化比较对创造力的影响可能不是单向的废止，而是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被转化为某种更高阶的认知能力。

而本文概念的另一面——假肢在什么条件下失效——已经在第三节的反面案例中给出了答案。发动回路没有被替代的条件，不是假肢不存在了，而是认知生态中存在着无法被假肢填平的结构缝隙。这些结构缝隙有三种形态：其一，面对无可比之物——当一个认知者面对的对象无法被现成的比较框架罩住时，假肢的预制维度就失效了，他必须自己去感受缺口；其二，可逆比较的空间——当认知者被允许沿着自己的追问方向重新拆解比较的基本单元时，假肢的标准化维度不再能垄断追问方向；其三，无终点评级的累积性比较——当比较没有一个可以被数字排名封死的终点时，假肢无法提供那种“我已经完成了”的闭合舒适感，闭合不耐就仍然在运转。这三种条件的共同点不是“远离现代技术”，而是“在特定的结构间隙中，发动回路无法被绕开”。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去怀念某个假肢到来之前的“纯真时代”——那个时代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假肢化的条件（标准化、可排名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形态存在。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反向证明假肢生效的精确逻辑：当且仅当这三个结构缺口——不可比的混沌、可逆的追问方向、无终点的闭合不耐——被同时填平时，假肢才能完成它的全部替代。

一个认识如果不能用事实去摔，它就只是一个装饰。比较假肢的核心判断，可以在上述条件下被证伪。证伪测试的关键在于“自主发动比较的能力”的操作化——必须是在不提供任何预置比较维度、不给予任何排名反馈、不给出任何指标评价的开放情境下，认知者面对一个新异而含混的、需要被比较理解的任务时，能被观察到的亲感缺口、自命名、闭合不耐的自发行为指标。本文把这个证伪条件写在这里，不放高调，不挂标语。整个理论站在它上面，等任何能把它推倒的事实来砸。

注释

[1] 本文所称“追问权诊断范式”并非某一特定学者的专属理论，而是对当代教育批判与数字文化反思中一种广泛共享的诊断逻辑的综合概括。其核心判断是：系统替人做了本该人自己做的认知动作（如提出问题、找出差距），人因此失去了执行该动作的能力。在教育批判领域，这一逻辑典型地体现在对标准化考试剥夺学生问题意识的批评中；在数字文化反思领域，则典型地体现在对算法推荐系统侵蚀用户主动探索能力的担忧中。本文将其提炼为一个统一的批评范式，以便与后续的“比较假肢”理论做出清晰区分。

[2] 本文所引教育研究中关于“过度支架化”导致自主学习能力衰退的讨论，参考了学习科学领域对支架撤除效应的一般性研究。这些研究的基本共识是：当学习者长期依赖高度结构化的外部支持而不经历支持逐步撤除的过程时，其独立发起学习行为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会显著减弱。本文第七节的论证以此共识为背景，但不将其归因于某一特定的实证研究。

[3] 第3.1节的法学学生案例和第3.2节的反面案例均为综合性的思想实验案例，其功能在于展示比较发动回路如何被假肢系统替代、以及在什么结构条件下替代无法完成的典型过程，而非对某个真实个体学习经历的纪实记录。案例中的人物、场景、系统反馈形式等均经过了匿名化与简化处理，不指向任何具体的学校、平台或个人。两个案例的构思参考了当前高等教育中智能学习诊断系统的通用功能特征（如知识点图谱、错题归类、自适应练习推送等），以及案例式研讨教学的一般形式，这些是可观察到的一般教育实践。

[4] 本文使用的“发动回路”是一个认知生成机制的描述概念，并非指涉神经生理层面的具体回路。它以齿轮咬合为隐喻，旨在刻画比较行为从内部被激发、推进到闭合的完整过程。读者不必从脑科学或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寻找其对应物。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wey, J. (1910). *How We Think*. D.C. Heath & Co.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Gallimard.
- Foucault, M.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 H. Martin, H. Gutman, & P. H. Hutton (Ed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Piaget, J. (1936). *La naissance de l'intelligence chez l'enfant*. Delachaux et Niestlé.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延展心灵论题、伊利奇“根本性垄断”的硬边界

正文与斯蒂格勒的技术代具论、追问权诊断范式、认知外包、规训理论、系统与系统二框架、布迪厄的误识六家区分，但放过了两个方向相反却同样致命的对手。克拉克与查尔默斯的延展心灵论题主张，当外部装置以恰当方式耦合进认知回路时，它就是心灵的一部分，因而“替代”这一说法本身预设了一条不成立的内外界线——这是对本文最根本的釜底抽薪。伊利奇的根本性垄断则从相反方向逼近：一项服务一旦垄断了某种需求的满足方式，人们便丧失自行满足它的能力，这已经说出了本文的“从捷径到唯一路径”。分野须分别给出。对延展心灵：本文不主张装置外在于认知，本文主张的是被替代的不是功能执行而是冲动发生——延展心灵所论证的耦合全部发生在执行侧，而一个耦合得再好的外部装置，也不会替你产生“这里不对”的那一下不适。对根本性垄断：伊利奇的丧失是能力层面的、且被丧失者可以察觉；本文的替代发生在感知层面，主体把自己不再走路这件事感知到自己还在走，因而不可自我察觉——正文的三步路径中，第三步“篡改感知”正是本文相对于伊利奇的全部增量。

增补二：发动回路三齿轮的测量

亲感缺口、自命名冲动、闭合不耐三个齿轮若无测量方案，正文的证伪检验就无法执行。建议：亲感缺口，测量个体在遭遇一个尚未被评价体系覆盖的对象时，自发报告“哪里不对”的发生率与延迟；自命名冲动，测量个体是否自行给出一个未在系统词表中出现的描述词来指认该对象，以及此类新词在其表述中的占比；闭合不耐，测量个体在被给出一个现成结论后继续追问的次数，及其在无外部反馈情形下的持续时长。三项都必须在系统预设维度之外的陌生问题上施测——这一条是设计的要害，因为在系统覆盖范围内测量，假肢化的使用者会表现得同样好甚至更好，从而系统性地掩盖差异。正文的证伪方案已包含这一约束，此处将其明确为不可省略的施测条件。

增补三：证伪方案的收紧

正文的证伪条件表述为：若长期使用假肢化体系的群体，其自主发动比较的能力不仅未退化反而显著优于完全不使用工具的对照组，则核心机制被证伪。这一表述须收紧两处，否则可被事后解释消化。其一，对照组不宜设为“完全不使用任何比较工具”，因为这样的群体在当代难以取得，且与实验组在教育程度等方面必然不可比；宜改为使用非闭环工具的群体，即工具只提供材料不提供结论。其二，“显著优于”须事先规定效应量与检验方向，并预注册，否则本文可以在结果出来后调整判读方向。两处收紧会使这条条件更难满足，也更值得信任。

增补四：与同批《选择的热寂》的分工

本篇与作者同批的《选择的热寂》共享同一个形式——外部装置替代了主体的某个发动动作，且替代不可自我察觉——须切开。本篇被替代的是比较的发动：那个察觉不对并自行命名追问方向的启动；那一篇被替代的是意愿的发生：那个从无可借用的寂静中生出方向的原发动作。两者所需的条件不同：比较的发动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与一道亲感缺口，意愿的发生需要一段不被填平的空白时间。因此两篇的干预含义也不同：本篇指向工具设计——把闭环工具改为只供材料不供结论；那一篇指向时间结构——撤除填平摩擦的环节。两篇宜互相标注，并共同追问：当代装置为何总是精准落在发动侧而非执行侧。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Andy Clark & David J. Chalmers, “The Extended Mind,” *Analysis*, 58(1), 1998.

Ivan Illich, *Tools for Conviviality*, Harper & Row, 1973.

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 La faute d'Épiméthée*, Galilée, 1994.

Wendy Nelson Espeland & Michael Sauder, “Rankings and Rea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1), 2007.

Betsy Sparrow, Jenny Liu & Daniel M. Wegner, “Google Effects on Memory,” *Science*, 333(6043), 2011.